

张家界旅游产品开发的空 间演化与乡村振兴分析*

麻学锋, 杨 雪

(湖南商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旅游产品是旅游业的核心,深入研究自然资源类旅游产品开发的时空演变对于了解区域旅游发展规律及旅游城镇形成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以张家界为例,从产业生成周期视角,分析张家界旅游产品与乡村振兴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不同阶段,旅游产品的空间分布格局有所不同,旅游产品开发与城镇化及乡村振兴交互影响,贯穿于旅游产品的时空演化过程中。(2)张家界旅游产品演化的内在动力来自于旅游经济价值,外在动力来自于游客多元化和阶段性需求差异;在内外动力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着旅游产品在空间上沿着一定轨迹不断演化和发展。(3)探索出一条“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城镇形成—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旅游产品;旅游城镇;乡村振兴;GIS分析;张家界

在线杂志: <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 F590-05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8)03-0048-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64)

作者简介: 麻学锋,男,博士,湖南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教授。

引用本文: 麻学锋,杨 雪. 张家界旅游产品开发的空
间演化与乡村振兴分析[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9(3):48-58.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核心是解决“三农”问题。旅游以其融合性好、带动性强、覆盖面广等特点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独特功能。在旅游供给侧改革环境下,旅游产品是旅游业的核心,是旅游者能够直接感受到的重要载体,也是反映旅游业繁荣与否的最直接体现^[1]。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不仅能给农民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也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已经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量。

旅游产品作为旅游地核心吸引物,其成长发展

与旅游地息息相关。自 Butler 提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在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2-6]。旅游地生命周期是不同阶段的旅游产品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在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的同时,也日益关注旅游产品在旅游地发展中的作用及演化研究。根据旅游产品的界定^[7],可将旅游产品理解为由核心吸引物即旅游景区(景点)与辅助产品(旅游接待设施)所构成。旅游产品的演化过程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8],相关研究侧重于从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及应用^[9-14]、驱动力^[15]、影响因素及演变机制^[16-17]等方面来揭示旅游产品演化的动态性特征,

* 收稿日期:2017-12-26

并逐渐认识到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与旅游产品的演化息息相关^[18-20]。随着研究的深入,已有成果对更深层次解释旅游地旅游产品的空间演化过程已显单薄,地理信息的广泛应用为更加全面解释旅游地旅游产品的空间演化提供了新视角。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旅游系统空间理论模型^[21-22]、旅游区空间布局^[23]、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特征与演化机制^[24-25]、旅游景点空间可达性^[26-28]进行了探讨。从已取得的成果可知:对旅游地成长理论的探讨多集中于理论模型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利用相关模型对旅游地成长及旅游产品演化进行分析,而对于旅游产品的空间演化关注不够,更鲜有文献对利用自然资源进行旅游产品开发的空間覆盖与乡村发展的关联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已有研究,多以时间或空间的静态视角分析见长,对其演化规律和机制的深层揭示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文结合旅游产业生成周期^[29],选取因“旅游立市”并实现旅游开发带动乡村振兴的张家界为研究对象,从出现期、生成期、发展期三个阶段深入分

析张家界旅游产品开发的空間演变及其演化机制。理论上可丰富旅游产品理论,实践上有利于整体揭示区域旅游产业演进过程,从而为旅游地相关部门的旅游产品决策与调控提供一个科学可行的实践依据,同时也为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的地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可借鉴的决策参考。

一、旅游产品开发与城镇化发展及乡村振兴分析

(一)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内涵及其阶段性特征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所描述的是旅游产业从出现到生成到发展这一动态过程所经历的时间阶段^[29]。随着周期阶段演变与内外影响因素变化,旅游产品在出现、生成、发展、成熟和衰退5个周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空間表征模式,旅游城镇形态也随旅游产业生成周期的阶段性演变而发生变化(表1)。

表1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产品类型、基本特征、空間结构表征及旅游城镇形态

周期阶段	产品类型	基本特征	空間结构表征模式	旅游城镇形态
出现期	自然观光型或人文观光型	接待少量游客或科学考察人员,少量景区(点)营业,少量的旅游接待饭店	点状	无明显街区形状
生成期	自然观光型、人文观光型、度假旅游型	游客数量逐渐增多,营业的旅游景区数量增多,旅行社、宾馆饭店数量逐步增加,交通运输业开始起步发展	点—轴	外延式扩展
发展期	自然观光型、人文观光型、度假旅游型、商务旅游型、民俗体验型	旅游人次大幅增加,旅游产业集聚(扩散),旅游产业规模效应凸显	圈层初步形成	轴向扩展
成熟期	自然观光型、人文观光型、度假旅游型、商务旅游型、民俗体验型、康体休闲型、旅游专项性等	旅游人次开始饱和,旅游规模效应增大,旅游业成为区域产业发展极,主导产业、产业转型升级	同心圆状	多中心扩展
衰退期	选择性产品开发	旅游人数骤减,旅游产业开始衰退	原有状态被打破	原有形态被打破

(二) 关联机理分析

旅游产品开发与旅游地城镇化及乡村振兴的关系,实质上是两两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的非线性关系的总和。旅游业可以拉动当地经济水平提高、加速城镇化进程的结论已得到有关学者的证实^[30-32]。旅游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处于核心地位,区域旅游业质量的高低与受欢迎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旅游产品的好坏。政府对旅游的认识随着旅游的兴起和带动效应也日趋重视,旅游是实现十九大提出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促进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张家界旅游产品开发对城镇化水平提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首先,通过旅游产品的开发及产业链的延伸,引发一定空間范围内的产业集聚效应,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汇聚,促成了旅游城镇的萌芽与成长,并形成良性循环,既壮大了旅游城镇规模又为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物质、服务、文化等方面的保障,进一步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体系优化。其次,在旅游活动中,由于旅游产品空

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推动要素间的流动,从而加速城乡互动,实现一体化发展。再次,旅游产品的开发能够带动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从而增强城镇旅游业发展基础和动力^[33]。

旅游产品在开发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旅游城镇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旅游业作为新型经济业态,旅游产品的开发可以将乡村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旅游发展优势,不仅有利于促进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促进乡村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乡村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受益者,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旅游产品开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激发乡村活力。

二、张家界旅游产品开发空间演变分析

(一) 旅游开发概况

张家界是湖南省辖地级市,原名大庸市,位于湖南西北部,澧水中上游,属武陵山区腹地,因旅游而建市,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张家界以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别具魅力的民俗风情闻名于世。旅游建市以来,张家界市按照“旅游立市、科教兴市、依法治市”的基本方略,全面实施旅游带动战略,旅游业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武陵源为核心旅游区,有中国首批入选的世界自然遗产等著名景区,永定区为市政府所在地,是全市经济、文化、交通和旅游服务等发展中心,慈利县的旅游产业随着江垭温泉、万

福温泉、张家界大峡谷等逐次被评为 4A 级景区而升温,桑植县拥有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九天洞、贺龙纪念馆等众多自然、人文景观。据相关统计资料整理显示:截止 2015 年底,张家界共有国家级 3A 及以上景区(点)16 个,其中 5A 级景区(点)2 个,4A 级景区(点)8 个,3A 级景区(点)6 个。旅游收入从 1989 年的 0.25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340.7 亿元,年均增长 38.82%;城镇化水平从 1989 年的 12.65% 提高到 2015 年的 44.60%;2016 年,旅游 GDP 259.91 亿元,对全市 GDP 的贡献率为 52.17%,旅游扶贫脱贫 21 505 人,旅游脱贫贡献率为 39.45%,旅游就业贡献率为 26.83%,旅游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贡献率为 42.61%。

(二) 旅游产品开发与旅游城镇化及乡村振兴的相关性验证

为了探究旅游产品开发与旅游地城镇化进程以及乡村振兴的相互关联程度,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34-36],根据各系统内部要素的本质特征,选取旅游收入代表旅游产品开发情况,选取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代表城镇化水平,选取农村居民纯收入代表乡村发展水平。研究期间为 1989—2015 年,所需数据主要来自《张家界统计信息网》《张家界统计年鉴》及《张家界统计公报》。

从静态角度看,通过对张家界旅游收入与城镇化水平及乡村发展水平分别做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旅游收入与二者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城镇化水平与旅游收入相关系数为 0.769 7(图 1),乡村发展水平与旅游收入相关系数为 0.960 9(图 2),均在 0.75 以上,表明旅游产品开发对城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都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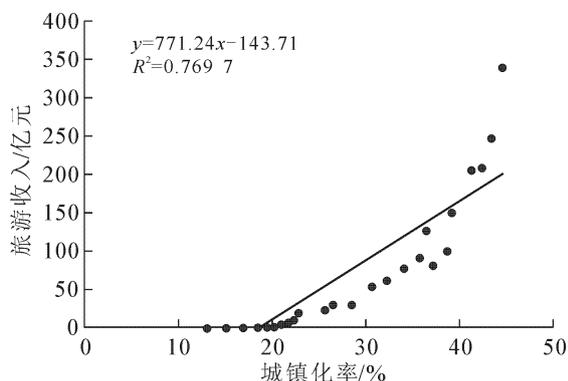


图 1 旅游产品开发与城镇化水平相关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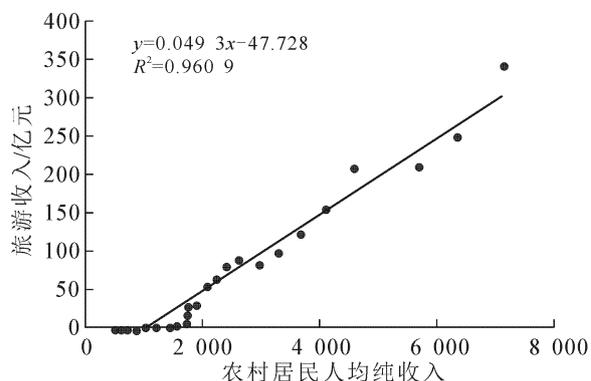


图 2 旅游产品开发与乡村振兴相关性分析

从动态角度看,为进一步分析二者对张家界旅游产品开发的影響程度,利用1989—2015年张家界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选择旅游收入(Y)作为因变量,综合反映旅游产品开发水平。选择城镇化率(X_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_2)为解释变量,分别代表城镇化水平、乡村发展水平。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方程:

$$\ln(Y) = b_0 + b_1 \ln(X_1) + b_2 \ln(X_2) + \epsilon \quad (1)$$

式中, b_0 为常数项, b_1 、 b_2 为相应的回归系数, ϵ 为随机扰动项。利用Eviews8.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如下回归结果:

$$\ln(Y) = 5.40 + 4.73 \ln(X_1) + 0.50 \ln(X_2) \quad (2)$$

从式(2)中可以看出,影响顺序为 $X_1 > X_2$ 。决断系数 R 为97.74%,调整的决断系数 R 为97.56%,即模型拟合效果很好。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的经济含义为:在1%的显著水平下,保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率每提高1%,旅游收入将增加4.73%;在城镇化率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旅游收入将增加0.50%。模型的现实意义是:城镇化水平和乡村振兴对张家界旅游产品的开发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科学布局旅游产业。

(三)旅游产品的空間演变过程分析

旅游产品是旅游需求与供给之间联系的焦点,是实现旅游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关系的连接点^[37]。旅游产品的空間演化与旅游产业的成长息息相关,依据旅游产业生成周期的阶段性特征,并结合张家界旅游业生成过程史实^[38],其演变大致经历了出现期、生成期、发展期三个阶段。

1. 出现期(1982—1998年)。这一时期旅游产品的空間布局呈现单核极化的发展模式。出现期武陵源风景区的形成主要是从三个方向进行开发建设。(1)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开发:1982年国务院确定在张家界设立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是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的开端。国家大笔建设资金的投入,加速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开发,逐渐形成以金鞭溪和黄石寨为核心的游览线路。旅游景区景点接待人数的增加也促进了旅游接待设施的完善。当时的宾馆建设主要在锣鼓塔、卸甲峪和刘家拐三地。从金鞭岩饭店在1982年开业始,先后在锣鼓塔建成的宾馆达到了20533m²,接待的床位数达到1498个。从投资主体来看,这些宾馆的建设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和大型国

企^[39]。游客接待基础设施的发展为旅游产品的集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加速了周边景区景点的开发,张家界林场成功开发为我国第一个森林公园。(2)索溪峪的开发:索溪峪是武陵源区政府驻地,是风景区的东大门,距张家界市区在30分钟车程内,用地条件良好,且位于金鞭溪下游^[40]。索溪峪在旅游开发建设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当地居民年收入仅为69元,生活水平低下,交通也十分不便。在列入湖南省重点保护区后,加速了索溪峪的旅游开发建设,在湖南省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带动宝峰湖、军地坪、黄龙洞、百丈峡等一些景区景点的开发建设,同时沿主要景点、景区的交通线及入口处,也集聚发展了一批简单的接待设施。索溪峪镇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景区基础设施及旅游接待设施的完善。1985年索溪峪境内第一家宾馆建成营业,1986年专家村宾馆开业,索溪峪景区内道路和游道建设也基本完成。索溪峪逐渐由原先封闭落后的小山村发展成为湖南省乡镇建设史上第一个旅游新镇,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乡村振兴之路。(3)天子山的开发:天子山位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内,是高台地,与张家界市交通联系相对不便,目前有天子山索道和水绕四门观光电梯沟通山下和山上。在大庸县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和慈利县的索溪峪的旅游开发带动下,促进了桑植县天子山的开发。1985年上半年《天子山风景区总体规划》中规划出包括石家檐景区、茶盘塔景区、老屋场景区、凤栖山景区、黄龙泉景区在内的5个景区共50个景点。景区景点的建设不仅带动景区内公路等基础设施及接待设施的完善,也促进了天子山小城镇建设,加快景区城市化进程,天子山经过旅游开发建设由原先的“养在深闺”逐渐开发成为游览观光和旅游度假胜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和天子山的开发建设,使得农村社区之间要素流动速度加快,拓宽了乡村居民的收入渠道,使乡村居民走上了脱贫致富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在1989年到1998年这10年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457元增长到1545元,年均增长率为12.95%,1998年,张家界市旅游从业人员4480人,与1989年相比,增长了5.74倍,越来越多的景区周边农民开始改变以往的农业和农村经济观念,从事旅游服务业。这彻底改变了当地贫困落后面貌,也进一步奠定了武陵源风景区的雏形。1987年“水绕四门事件”之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和天子山分属2地区3县的行政管理现

状,受到旅游发展的猛烈冲击。继续维持现状,不仅不利于当地的旅游开发建设和旅游发展,而且威胁到地区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98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大庸地级市,并新设立武陵源区来统一管理索溪峪、天子山以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既有效解决了行政割据所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也为原三县交界的乡村走上全面振兴铺平了道路。张家界森林公园、索溪峪和天子山由“三分”,走向武陵源的“一统”,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最终形成。至此,旅游产品的空间演化经历了由多极点向单核极化的空间发展格局的转变;同时,也在景区内形成了接待性质的旅游城镇,旅游景区城镇化初现端倪。

1992年张家界武陵源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城镇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速。1993年版的城市规划将张家界定位为世界自然遗

产—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及湘西北的旅游服务基地,发展中的国际性旅游城市等,完成农林业城镇向旅游城镇(市)的转变。围绕建设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城市建设进入崭新阶段,空间规模稳步扩张,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由1989年的7平方公里增加到1998年的12.5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从1989年的12.65%提高到1998年的21.48%。由于风景旅游资源是一种舒适性商品,具有唯一性、真实性、和不可逆性,其开发利用的收益非常高,远远超过了社会平均利润,在旅游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各方利益主体趋之若鹜,纷纷在景区内兴建接待设施,旅游接待的压力带来了接待设施的快速增长,同时也造成了景区的无序化建设,严重破坏了景区内风景名胜资源,影响了景区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导致了1998年世界教科文组织的黄牌警告(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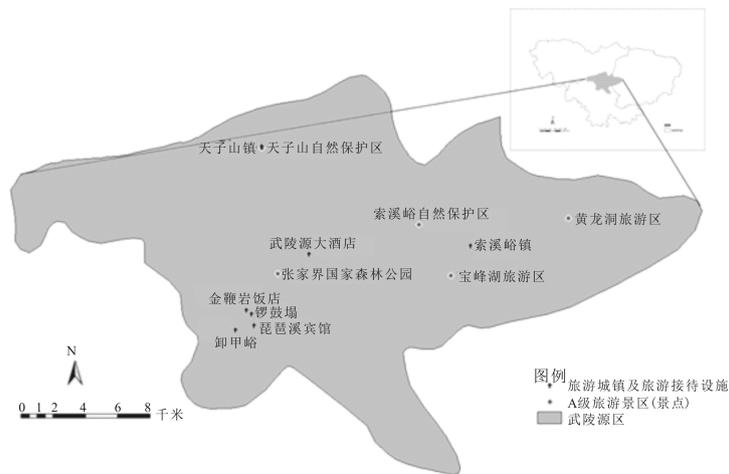


图3 出现期(1982—1998年)张家界旅游产品空间分布格局

2. 生成期(1999—2007年)。黄牌警告后,张家界政府在1999年开始拆除违章建筑190处,1.5万平方米,搬迁经营户400户。对核心景区中的25000多平方米建筑物进行了拆除,原先分散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和天子山景区范围内的旅游宾馆和其他设施先后被拆除,搬离景区,相继搬到空间距离较近的永定区和索溪峪镇,城乡间的要素流动不断加快,形成了景区游、市区住的格局^[29]。同时,原来在核心景区的农村村落除了保留作为景区一部分的少数村落,大部分也在政府统一安排下搬离景区,在城镇里进行安置,转为城镇居民,从事相关旅游接待业。这一时期旅游从业人员由5905人增长到35000人,城镇化率由22.24%增长到35.61%。这些举措推动了永定区和索溪峪镇酒店、宾馆及其他旅游接待设施的不断

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不断延伸,城乡间基础设施的差异逐渐缩小,一些乡村在旅游产品开发的过程中逐渐转化为城镇,城镇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市辖区建成区面积由13平方公里增加到20.5平方公里。农民的收入渠道也进一步拓宽,从1999年到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727元增加到2607元。旅游产品的开发也促进了部分农民转移就业,推动了传统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农家乐以及一些服务于旅游业的农业产品专业化服务逐步兴起。在资源择优和距离择近的规律作用下,永定区与索溪峪镇逐渐形成新的旅游增长极,也完美地实现了乡村振兴过程。这个阶段的交通得到了极快的发展,航空客运方面,1999年张家界机场开始向国际方向发展,先后开通香港和澳门地区航线,港澳航线开通,进一步开拓了

张家界的海内外市场。铁路交通方面,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其一,完成了张家界火车站的扩建;其二石长铁路开通后,大大缩短了湖南省会长沙与张家界之间的通行时间(长沙至张家界2001年铁路运行图,经过石长线所需时间为经过湘黔线的时间的一半);其三是以张家界为始发的车次增加,尤其是张家界与国内重要客源地长沙、北京、湛江等重要客源地对开车次,对增加张家界国内客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公路交通上,一方面,张家界围绕旅游核心景区的旅游公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如张家界市第一条高等级公路张清公路(连接张家界市区和武陵源区),总投资28557万元;另一方面,张家界与外界的公路交通建设,纳入国家和湖南省重点公路建设计划,如张罗二级公路,是张家界通往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的通道^[41],交通条件的改善极大地增强了旅游目的地可进入性。

为加快旅游开发,张家界政府加强与下属各级政府间的利益协调,从制度上创新投融资模式,出台招商引资和旅游投资优惠政策,与旅游经营制度创新并行,鼓励并积极引进外资和区域内外民间资本加入旅游开发,使得风景区城市化速度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与旅游产品的开发。这期间最大的景点投资建

设是天门山次级核心景区。1999年,举办了“穿越天门”飞行特技表演,使得张家界天门山赢得了国内外的空前关注。天门山旅游正式开发于2001年,期间利用民间资本先后投资6.3亿元,并历经10年发展,成为了继武陵源后的又一个5A级景区。次级核心景区天门山的开发与武陵源风景名胜形成了强有力的联动效应,天门洞、盘山公路、鬼谷栈道、观光索道等自然景观的开发使得天门山成为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同时也填补了张家界文化山水旅游项目的空白,并有效地实现了旅游产品的空间拓展^[42]。

次级核心景区天门山的开发也带动了土家风情园、秀华山馆、大庸府城景区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开发建设,形成了“武陵源”和“天门山”共同带动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的“双核心”格局。受市场效应吸引,一批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景点相继在武陵源和永定区建成开放,如魅力湘西民俗表演等一些旅游文化演出实体。同时,常张高速建成通车;张清、慈索公路完成改造也加速了旅游客流的流动,缓解了武陵源核心景区的客流压力,使得天门山景区作为新的增长极逐渐发展起来,双核间联动程度与日俱增,进一步完善了张家界旅游产品的空间布局。(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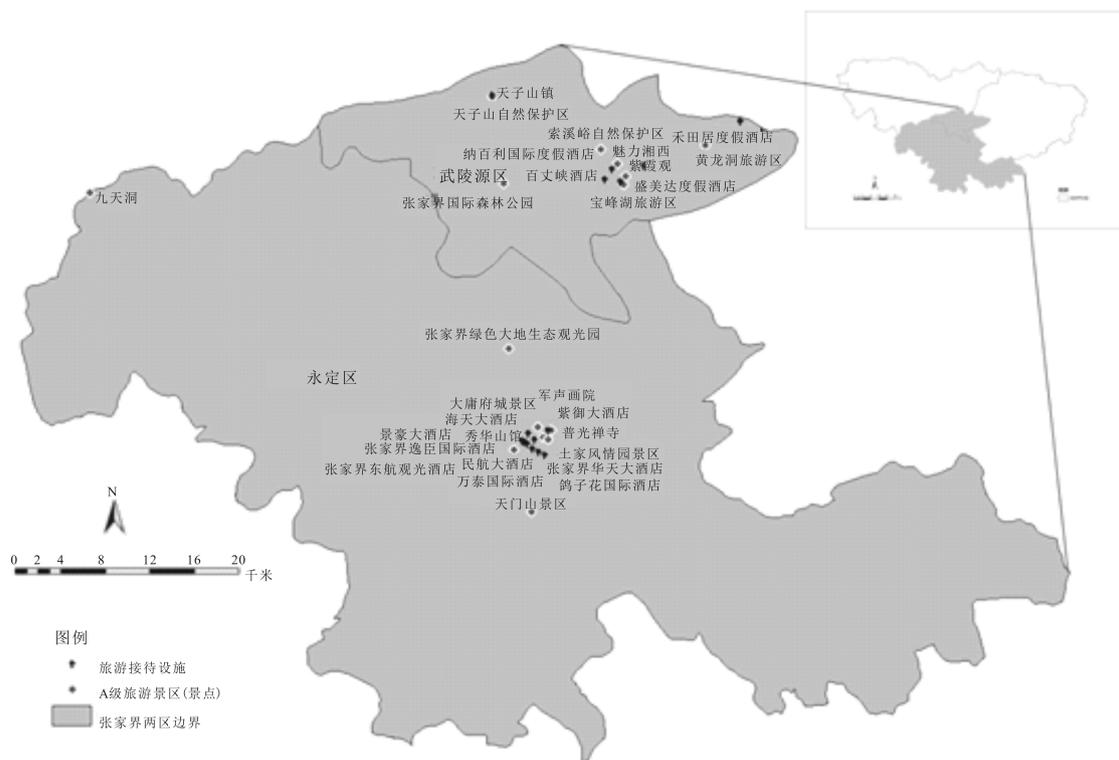


图4 生成期(1999—2007年)张家界旅游产品空间分布格局

3. 发展期(2008—2015年)。经过多年发展,大批游客蜂拥而至,需求也不断变化。旅游开发也从村到镇到城,城乡互动加快,大量资本开始往乡村寻找机会,城乡体系的连接性不断增强,功能分工日趋明显,张家界旅游产品在城乡体系的连接上起到了桥梁与纽带作用。尽管张家界旅游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已经初步培育了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基本建成符合大众旅游市场需求的吸引物体系和传统旅游产业体系,初步完善了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配套体系;但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极不协调,旅游产品的空间布局不尽合理等一些的问题。旅游产品多集中分布在武陵源区和永定区,武陵源区与永定城区周边旅游产品的开发极大地提升了城镇化水平,带动了旅游产业集聚。在旅游容量的限制和约束下,旅游产品在武陵源区和永定城区集聚的同时向周边城镇不断扩散,使得城镇面积不断扩大,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提升,从而推动了慈利县和桑植县旅游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在旅游集聚与扩散效应的影响下,慈利县江垭镇加快了温泉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建设,推动区域内住宿、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得城镇化速度迈上新台阶,慈利县去年末城镇化率42.2%,同比增长7.64%,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976元,同比增长9.8%。2012年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以及《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的出台,进一步刺激了旅游消费需求,客观上为张家界带来了大量的客流。而随着2008年张家界政府出台并实施了“三年上台阶五年大变化”加快旅游发展的政策到2013年推出“1656”行动计划,提出“一城一区,错位发展”“三星拱月,全域旅游”发展思路,对全市旅游资源的重新归类组团,张家界政府在实践中探索出了“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社区参与”的旅游开发模式,积极调动旅游企业参与旅游景区景点的开发建设,慈利县江垭镇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与服务设施的完善,使得慈利县逐渐形成了江垭温泉和张家界大峡谷为依托,向龙王洞、万福温泉、五雷山风景区、娄江漂流、赵家垭旅游度假区等景区景点辐射的旅游格局。慈利县核心增长极的产生,标志着多中心组团扩展型旅游产品分布格局的形成。

这一时期,旅游产业融合趋势越来越突出,最为明显的是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在依托原有旅游景区(点)基础上,发掘地方文化,创新民俗旅游演艺产品,如梯玛神歌、魅力湘西大剧院、梦幻张家

界、张家界大剧院、黄龙洞哈利路亚厅的《烟雨张家界》、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等,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旅游产品体系。在仅有两县两区的张家界市境内已经规划出了张家界东线、西线及城区旅游线路,东部观光休闲旅游带、西部生态人文旅游带。这些景点不仅包含自然旅游资源,而且民俗、红色旅游资源业囊括其中,以满足游客“求新、求异”的旅游心理。乡村旅游在这一时期也开始逐步发展^[43]。张家界充分利用现有的乡村资源,大力发展城市农业、旅游农业、品牌农业、生态农业,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断提高,2015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094元,比上年增长12.03%。围绕旅游业发展趋势和旅游市场需求,张家界市大力拓展旅游产业链,充分发挥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永定区加快开发建设槟榔谷线路、石堰坪线路、七星山线路、崇山线路等乡村休闲旅游产品,建设培育了石堰坪、关水坪等全国闻名的土家民俗村,打造了长茂山桃花、罗水油菜花、桥头金银花、沙堤梨花、后坪荷花、王家坪杜鹃花等“六朵金花”^[44]。慈利县新开辟了朝阳地缝、娄江漂流、南山桃源、拉磨峡谷、四十八寨、红岩岭、黄花溪等户外精品旅游线路,成为攀岩、漂流、溯溪、速降等户外运动的好去处^[45]。桑植县策划推介了刘家坪洪家关红色旅游、八大公山探险旅游和风峦溪苦竹寨民俗旅游等旅游线路^[46]。一系列乡村旅游景点与线路的培育,极大地丰富了张家界旅游休闲度假产品(见图5)。

(四)张家界旅游产品空间演化机制及乡村振兴模式分析

1. 旅游产品空间演化机制

旅游产品的空间演化,是区域内城乡间相互作用与联系、相互竞争与合作的产物。在作用形式上,空间相互作用形式表现为集聚与扩散效应。其演化的内在动力来自于旅游经济价值,即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外在动力来自于游客多元化和阶段性需求差异。在张家界旅游产品演化的不同阶段,旅游利益相关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旅游者需求变化为导向,伴随着旅游地空间结构功能的变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同时旅游产品受到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等主体的相互作用,在空间上沿着一定轨迹不断演化和发展。结合前文旅游产品的空间演化过程分析,可将张家界旅游产品空间演化机制绘制图6所示。



图5 发展期(2008—2015年)张家界旅游产品空间分布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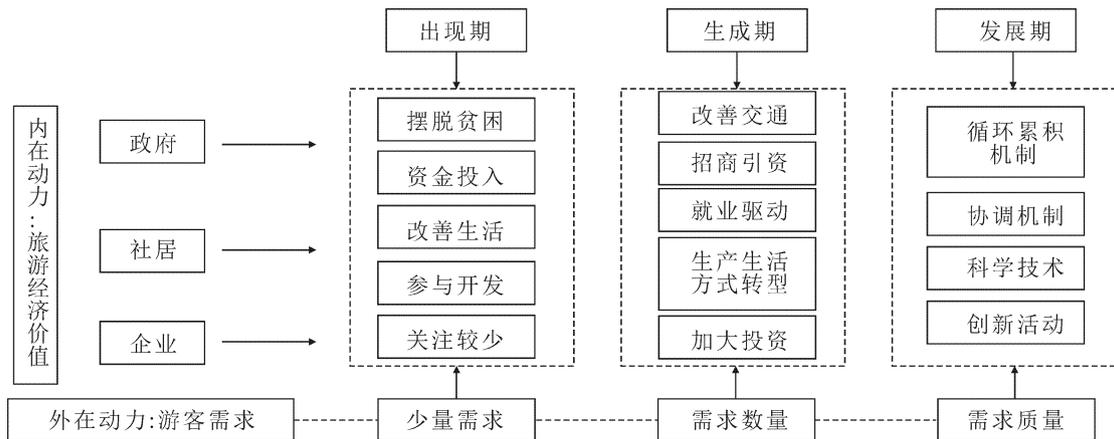


图6 张家界旅游产品空间演化机制分析

出现期内张家界旅游产品单核极化空间格局的形成,最原始的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禀赋及地方政府和人民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政府对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是张家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在旅游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起关键作用,通过对景区景点及旅游接待设施的资金投入吸引了大批游客,同时社区居民为了改善生活,追求幸福,也主动参与到旅游开发中,通过家庭宾馆的修建获得旅游收益。在政府与社区居民的共同作用下促进了核心旅游产品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形成,实现了旅游产品由多极点向单核极化的空间发展格局的转变。

生成期,张家界市政府对交通设施的完善加速了核心景区旅游产品的集聚,而旅游产品在集聚的

过程中带动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社区居民为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开始向这些地区集聚,从而导致城镇空间的集聚与扩张,景区居民居住空间稀释化^[47]。社区居民居住空间更多开放为满足游客需求的综合空间,社区居民的生产方式随之改变,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导致了社区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的转型,乡村空间格局随之改变,从而进一步加速城乡融合与景区城市化进程。同时由于景区交通可达性的提高,使得景区的游客接待量迅速增加。旅游需求数量的增长对旅游产品的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以及调整旅游开发政策不断满足大众对景区休闲度假多元化消费需求,推进旅游交通、住宿接待等设施优化及景区景点的创新开发,同时由于过度旅游开发建

设,集聚不经济效应开始逐步显现出来。此时,永定区作为中心城区,受到武陵源核心景区的辐射较强,其城市化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旅游基础及接待设施的完善,推进了新景区天门山景区的开发,最终形成了双核联动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

发展期,乡村地区作为新时期旅游业发展的主战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迫切要求。在旅游需求质量的引导下,通过旅游各要素的延伸带动整个旅游圈层实现可持续发展,加速要素的流动与产品的集聚。在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建构下,在满足当地社区空间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游客空间消费需求,并通过旅游产业集聚,形成以旅游产品为依托的旅游小城镇,加上旅游服务设施的需求和消费的集中化,形成完善的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及社会体系,而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接待空间的生产也为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品质的提升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推动旅游目的地体系的建设^[48]。在旅游容量的限制和约束下,受到旅游经济价值的内在驱动以及资本逐利性影响,旅游产品在向周边乡村扩散过程中形成新一轮的集聚,在这种循环累积机制的作用下,使得张家界旅游产品演化呈现同心圆圈层发展模式(见图7),旅游地产品功能、结构日益完善。慈利县由于地理上的邻近性,受到武陵源和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的经济辐射程度相对较大,同时政府通过建立长效协调机制促进了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此外,科学技术、创新活动的广泛应用也促进了旅游产品在空间上的演化。因此,在各种要素的综合作用下,旅游圈层内交通网络、旅游产品、品牌以及旅游客流流动等呈现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态势,多中心组团扩展型旅游产品分布格局由此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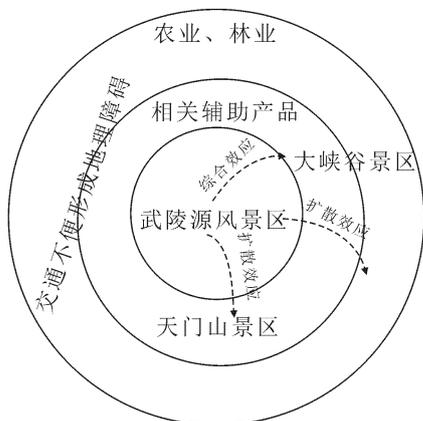


图7 张家界旅游产品同心圆圈层发展模式图

2. 乡村振兴模式

张家界在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实现了“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城镇形成—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

在内在动力旅游经济价值和外在动力游客需求的驱动下,张家界旅游产品在空间上不断演化。出现期,核心旅游产品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形成取决于旅游资源禀赋及地方政府和人民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旅游产品的开发带动了相关旅游接待设施与基础设施的发展,旅游城镇开始形成,进一步加速乡村居民向城镇的集聚,从而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开始走上乡村振兴道路;生成期,“双核心”旅游产品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得益于各级政府及企业的培育、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通过交通设施的改善加速城乡间要素的流动,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与基础设施的完善推动新城镇的形成,新城镇围绕旅游产品开发逐渐形成新的旅游增长极,完美实现了乡村振兴过程;发展期,在基础设施、接待设施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旅游产业集聚、扩散效应不断增强,在循环累积机制的作用下,最终形成多中心组团扩展型旅游产品分布格局。

三、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基于旅游产业生成视角划分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分析旅游产品开发空间演化与旅游城镇化及乡村振兴的关联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1. 从旅游产业生成周期与旅游产品空间演化过程来看,在出现期,旅游产品的空间演化格局经历了由多极点向单核极化的转变;在成长期,形成了“武陵源”和“天门山”共同带动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的“双核心”格局;在发展期,形成了多中心组团扩展型旅游产品分布格局。

2. 张家界旅游产品开发空间覆盖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一方面,张家界旅游产品开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旅游产品空间演化是在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共同作用下,受到各动力因素驱动,旅游产品实现了由低端向高端演化的过程。旅游产品空间上的演化以旅游城镇为依托,集聚与扩散是其空间演化的基本动力。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是随着旅游产品开发空间范围的扩大而实现的,在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带动了一批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并促进了乡村传统生产方式转型,在旅游经济价值和游客阶

段性需求差异综合作用下,旅游产品空间格局不断演化,最终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二) 讨论

张家界旅游开发是在旅游开发之初的国家层面面对其采取“不鼓励、不提倡、不宣传”的“三不”政策下实现的,促使张家界旅游产品开发从一开始就是对应市场需求,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满足游客需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产品开发在空间上的拓展,实现旅游产业覆盖乡村地区,促进乡村地区产业就业转型,探索出一种“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城镇化形成—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实现了旅游开发与乡村振兴并举的和谐格局。

对张家界旅游产品开发的时空演化与乡村振兴过程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旅游产品开发空间覆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同时对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助推“美丽乡村”建设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另外,本文仅从旅游产业生成视角,尝试剖析其形成的动力机制,并未对各阶段的影响因子及影响程度进行有效辨识和测量,无法明确各阶段主要的驱动因子及权重大小。旅游产品的时空演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调整对策是以现有资料及资源开发为基础的^[49],随着未来开发项目的不断推进及相关资料的日益完善,旅游产品的调整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明晰各周期阶段的主动动力因子并对其定量化分析、结合全域旅游的背景制定旅游产品开发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将是日后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刘锋. 创新理念, 构筑立体旅游产品体系[N]. 中国旅游报, 2012-02-01.
- [2] 陆林. 山岳型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 安徽黄山、九华山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 1997(1).
- [3] 邵晓兰, 高峻. 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现状和展望[J]. 旅游学刊, 2006(6).
- [4] 保继刚, 郑海燕. 苏州城市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系统动态研究[J]. 规划师, 2004(11).
- [5] Debbage K G. Oligopoly and the resort cycle in the Bahama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0, 17(3).
- [6] Weaves D B. Grand Casyman Island and the resort cycle concept[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3, 29(2).
- [7] 吴晋峰. 旅游吸引物、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和旅游体验概念辨析[J]. 经济管理, 2014(8).
- [8] 喻艳, 王志云, 蒋敏. 湘西凤凰旅游产品结构优化路径探讨[J]. 市场论坛, 2010(10).
- [9] 刘泽华, 张捷, 黄泰, 解杆. 旅游地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复合模型初探——旅游地生命周期的一种机制假说[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3).
- [10] 张晶. 旅游地—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复合模型拓展研究——以桂林为例[J]. 浙江学刊, 2015(3).
- [11] 陈亮, 宋启平, 张海东, 王昂.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印象·刘三姐》项目研究[J]. 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6(12).
- [12] 贾玉成. 旅游风景区产品生命周期与产品的创新(上)[J]. 改革与战略, 2004(6).
- [13] 孙根年, 薛刚. 25年来秦俑馆旅游生命周期与结构变化研究[J]. 干旱区地理, 2007(2).
- [14] 徐红罡. 潜在游客市场与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系统动力学模型方法[J]. 系统工程, 2001(3).
- [15] 郭金海, 任黎秀, 钟士恩, 韩雪, 李世玲. 基于供求关系的庐山旅游地生命周期驱动力分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8(2).
- [16] 税伟, 任万红, 张斌, 王兴贵, 陈银, 周虎, 徐学义, 范新浩, 王莉. 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地生命周期影响因素及演变机制——以兴文石海为例[J]. 四川地质学报, 2009(1).
- [17] 周年兴, 沙润.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形成过程与生命周期初探[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2001(1).
- [18] 杨效忠, 陆林, 张光生, 等. 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产品结构演变关系初步探究: 以普陀山为例[J]. 地理科学, 2004(4).
- [19] 李德明, 杨开福. 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黄山市旅游产品结构演变研究[J]. 黄山学院学报, 2006(2).
- [20] 孟霏, 杨惠. 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深度开发的实证研究: 以张家界为例[J]. 江苏商论, 2017(6).
- [21] 彭红松, 陆林, 路幸福, 凌善金. 基于旅游客流的跨区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优化——以泸沽湖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3).
- [22] 邓祖涛, 周玉翠, 梁滨. 武汉城市圈旅游流集聚扩散特征及路径分析[J]. 经济地理, 2014(3).
- [23] 杨仲元, 卢松. 交通发展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以皖南旅游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13(7).
- [24] 程晓丽, 黄国萍. 安徽省旅游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J]. 人文地理, 2012(6).
- [25] 吴丽敏, 黄震方, 周玮, 方叶林. 江苏省A级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动力机制[J]. 经济地理, 2013(8).
- [26] 潘竟虎, 从忆波. 基于景点空间可达性的中国旅游区划[J]. 地理科学, 2014(10).
- [27] 蒋海兵, 刘建国, 蒋金亮.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全国旅游景点可达性研究[J]. 旅游学刊, 2014(7).
- [28] 靳诚, 陆玉麒, 范黎丽. 基于公路网络的长江三角洲旅游景点可达性格局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10(2).
- [29] 麻学锋, 何颖怡.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与机制研究[J]. 地理科学, 2016(5).
- [30] 麻学锋, 孙根年. 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与机制

- 分析[J]. 旅游学刊, 2012(3).
- [31] 钟家雨, 柳思维, 熊曦. 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 经济地理, 2014(2).
- [32] 张春燕. 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评价模型[J]. 统计与决策, 2014(14).
- [33] 李肇荣. 旅游经济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34] 王兆峰, 谢娟. 我国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对比实证分析[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 [35] 唐新平, 刘彬, 麻学锋. 湘西地区旅游产业成长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分析[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 [36] 黄震方, 陆林, 苏勤, 章锦河, 孙九霞, 万绪才, 靳诚.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J]. 地理研究, 2015(8).
- [37] 粟娟, 田金霞, 许建. 张家界体验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09(3).
- [38] 何颖怡, 麻学锋. 产业生成视角的旅游内部就业层次分析——以张家界为例[J]. 人文地理, 2013(5).
- [39] 麻学锋, 孙根年.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 SGGT 模式与空间演化——以张家界为例[J]. 地理研究, 2013(10).
- [40] 周年兴, 俞孔坚. 风景区的城市化及其对策研究——以武陵源为例[J]. 城市规划汇刊, 2004(1).
- [41] 夏赞才. 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史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 [42] 麻学锋, 何颖怡, 孙根年. 旅游投资决定机制及其时空响应——以张家界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2).
- [43] 付友良. 张家界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 科技创业月刊, 2015(23).
- [44] 廖声田. 张家界永定区: 全域旅游全线开花有特色[N]. 湖南日报, 2016-05-15.
- [45] 宋世秀. 慈利县全域旅游风生水起[N]. 张家界日报, 2016-01-05.
- [46] 黎治国. 旅游扶贫富了农[EB/OL]. (2016-04-20) [2016-09-15]. <http://www.szxnews.com/asp?ModelId=1&Id=12969>.
- [47] 黄剑锋, 陆林. 旅游业“新常态”: 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的新动力[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6).
- [48] 席建超, 王首琨, 张瑞英. 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 自然资源学报, 2016(3).
- [49] 田李娟. 华山与渭南市旅游成长及产品结构分析[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责任编辑: 粟世来)

Spatial Evolution of Tourism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Zhangjiajie

MA Xuefeng, YANG Xue

(College of Tourism Management, Hunan Commerce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ourism products are the core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tourism product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we can understand the law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formation of tourism town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Zhangjiaji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ourism products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generation cycl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ourism products is differ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m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runs through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tourism product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tourism product evolution in Zhangjiajie comes from the economic value of tourism, and the external motivation comes from the diversity of the tourists and their needs in different phases.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s, the tourism product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volving and developing along the track in space. The results indicate a development model of "tourism product development-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tourism town form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tourism products; tourism town; rural revitalization; GIS analysis; Zhangjiajie